文史哲论丛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ISSN Print: 3079-5400
ISSN Online: 3079-5419
https://doi.org/10.63313/LHP.8035

中国丧葬文化中的隐喻：生死、家族与道德的交织

吕宁

天津外国语大学，天津市

发布日期：2026年4月30日

摘　要

中国丧葬文化中存在大量隐喻性表达与象征行为，如归大屋事死如事生、五服制度、盖棺定论等。这些隐喻不仅是语言修辞现象，更是一种深层的文化认知建构。本文以文化隐喻理论为视角，分析中国丧葬仪式中的语言与象征行为，探讨其如何体现中国人对生死、家族与道德的理解。研究表明：在生死层面，事死如事生归大屋等隐喻将死亡重构为灵魂的迁徙与安顿，而非存在的终结；在家族层面，五服制度将血缘亲疏秩序转化为可视化的身体符号体系，实现对家族关系的确认与强化；在道德层面，慎终追远盖棺定论等隐喻使丧葬仪式成为道德教育与社会评价的实践现场；在社会功能层面，丧葬仪式通过差序格局的仪式化重演，完成社会关系的整合与秩序的再生产。中国丧葬文化中的隐喻系统融合为一套关于生命延续、伦理秩序与社会整合的深层文化逻辑。

关键词

丧葬文化；文化隐喻；生死观；家族伦理；仪式象征

Metaphors in Chinese Funeral Culture: The Interweaving of Life and Death, Kinship, and Morality

Ning Lv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204, China

Abstract

Chinese funeral culture abounds in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and symbolic practices, such as returning to the great house, serving the dead as if they were living, the five-grade mourning system, and the final verdict on a person’ s life. These metaphors are not merely rhetorical devices but deep-seated forms of cultural cogn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etaphor theory,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linguistic expressions and ritual behaviors in Chinese funerals and

文章引用：　吕宁. (2026). 中国丧葬文化中的隐喻：生死、家族与道德的交织[J]. 文史哲论丛, 1(3), 62-66.
ISSN (Print): 3079-5400; ISSN (Online): 3079-5419.
DOI: 10.63313/LHP.8035

explores how they reflect Chinese understandings of life and death, kinship, and morality.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In the dimension of life and death, metaphors such as serving the dead as if they were living and returning to the great house reconfigure death as the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of the soul rather than the end of existence. In the dimension of kinship and family, the five-grade mourning system translates blood relationships into a visible, embodied sign system, thereby confirming and reinforcing family ties. In the dimension of morality, metaphors such as cautious attention to the end and continuing reverence for the distant and the final verdict transform funeral rituals into a practical site for moral instruction and social evaluation. At the social level, the funeral reenacts the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in ritualized form, facilitating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social order. Taken together, the metaphorical system in Chinese funeral culture constitutes a deep-seated cultural logic concerning the continuity of life, ethical order, and social integration.

Keywords

Funeral Culture; Cultural Metaphor; Conception of Life and Death; Family Ethics; Ritual Symbolis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Erytis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隐喻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束定芳指出，隐喻并非单纯的语言修辞现象，而是一种认知机制，人类通过隐喻来理解抽象概念和陌生经验[1]。文化隐喻则是这一认知机制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具体呈现，它既是语言现象，也是文化心理与社会逻辑的折射。中国丧葬文化是文化隐喻的密集场域。从“归大屋”“事死如事生”等日常表述，到五服制度、“慎终追远”“盖棺定论”等仪式规范，丧葬活动中充斥着各种隐喻性的语言与象征行为。这些隐喻并非随意的修辞堆砌，而是一套有机的文化解释系统——它们帮助人们理解死亡、安顿情感、维系家族、传递道德。可以说，中国丧葬文化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隐喻来建构和运作的。现有研究已从多个角度触及这一问题。郭于华在分析中国民间丧葬仪礼时指出，丧葬中的象征行为实质上是生者对死亡理解和生命执着的隐喻性表达[2]。冯智明从身体实践与物象隐喻入手，考察了桂北红瑶葬礼中的仪式过渡机制[3]。王夫子系统梳理了殡葬文化中的象征体系与功能[4]。然而，上述研究多集中于某一具体仪式或某一地域个案，对丧葬文化中隐喻的整体性结构——其如何同时处理生死、家族与道德三重问题——尚缺乏系统的理论梳理。

本文以文化隐喻理论为视角，对中国丧葬文化中的隐喻系统进行整体性分析。研究聚焦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丧葬文化中存在哪些核心隐喻？第二，这些隐喻如何体现中国人对生死、家族与道德的理解？第三，这些隐喻在文化功能上如何相互关联并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2. 文化隐喻的认知维度

隐喻研究经历了从修辞学到认知语言学的范式转换。在传统修辞学视野中，隐喻被视为语言的装饰性手段，是对常规表达的偏离。Lakoff 和 Johnson 的认知隐喻理论颠覆了这一认识，他们指出，隐喻是人类思维的基本特征，我们的概念系统本质上就是隐喻性的[5]。束定芳进一步阐明，隐喻的认知功能在于帮助人们通过熟悉的、具体的经验领域来理解陌生的、抽象的经验领域[1]。

文化隐喻是认知隐喻理论向文化层面的延伸。一种文化反复使用某一特定经验领域来理解和建构另一经验领域，久而久之，这种隐喻映射便成为该文化的“默认设置”，沉淀为集体无意识层面的认知模式。例如，中国文化将“家”作为理解世界的原型意象，形成了“家国同构”的宏大隐喻系统；将“死亡”隐喻为“归”，则体现了中国人对生命归宿的独特理解。

因此，分析丧葬文化中的隐喻，不能仅停留在语言层面的词汇分析，而应将仪式行为、物质符号、空间安排一并纳入考察。王夫子指出，殡葬活动中的每一个环节几乎都具有象征意义，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文化符号系统[4]。钟敬文在讨论民俗仪式时也强调，仪式象征是民俗研究的重要对象，其意义需要通过隐喻分析来揭示[6]。

本文正是在上述理论基础上展开分析。以下将从生死隐喻、家族隐喻、道德隐喻和社会功能隐喻四个维度，依次考察中国丧葬文化中的隐喻系统及其文化逻辑。

3. 中国丧葬文化中的隐喻分析

3.1. 生死隐喻：死亡的空间化重构

中国人对死亡的言说充满回避性表述，“走了”“没了”“去了”“仙逝”“归西”等委婉语共同构成了一个语义场：死亡被描述为某种状态转换，而非彻底的终结。这种语言现象背后是一种深层的认知隐喻——死亡即空间位移。

“事死如事生”是这一隐喻系统中最根本的原则。据《士丧礼》记载，儒家丧礼的核心是侍奉死者的神魂与体魄——体魄归葬于土，神魂则由亲人迎回，在宗庙中按时祭祀[7]。陈绪波的研究表明，“事死如事生”并非要求生死完全一致，而是通过仪式性的侍奉来建构一种认知上的连续性：死者并未消失，只是改变了存在方式[7]。这一认知在“归大屋”的表述中得到最集中的体现。民间将大殓入棺称为“归大屋”[4]，棺材由此被隐喻为死者在另一个世界的居所。棺材材质的选择同样具有隐喻意味：松柏象征长寿，柳木因不结籽而被认为会导致绝嗣[8]。可见，棺材制作不仅关乎工艺，更关乎家族延续的象征性表达。汉字的构造也为这一隐喻提供了佐证。“死”的甲骨文字形为一人跪于尸骨旁哀悼[9]，字形传递的信息并非生理死亡的客观描述，而是“活人在乎”的文化态度。“葬”字的构形则直观呈现了安置遗体的行为。汉字以形象表意，其构字逻辑本身就是隐喻思维的产物。

孟庆楠在分析传统丧祭之礼时指出，冠、婚、丧、祭四礼构建了一个人伦代际生成的时间序列[10]。丧礼安顿逝者的神魂，祭礼则使逝者以“在场”的方式继续存在于家族记忆之中。这一机制的核心功能在于：通过仪式性的安置与追念，死亡被重构为灵魂向彼岸的迁徙，而非存在的绝对终结。

3.2. 家族隐喻：身体符号化的血缘秩序

在中国丧葬文化中，家族与血缘关系从不以抽象概念的形式存在，而是被编码在一套精密的物质符号体系之中。五服制度是其最典型的代表。

五服即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种丧服等级。斩衰以极粗生麻布制成，不缝衣边，服期三年，适用于父母、丈夫等至亲；缌麻则服期仅三月，适用于远亲；五服之外则不属服丧范围[11][12]。这一制度的隐喻逻辑十分清晰：丧服的粗重程度与服期的长短，直接映射了血缘关系的亲疏距离——关系越近，丧服越粗、服期越长；关系越远，丧服越精细、服期越短。徐吉军、贺云翱在《中国丧葬礼俗》中详细记录了五服制度的执行细则[12]。从关联理论的角度看，五服制度本质上是一套“外显的血缘秩序图谱”：每一位家族成员通过自己穿戴的丧服，即可获得自身在家族网络中的确定位置。这一符号系统将抽象的宗法伦理转化为可直观辨认的身体修辞，降低了家族秩序的认知成本。“成服”仪式（大殓后

亲属按制穿戴丧服）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身体化编码过程[12]。冯智明在分析桂北红瑶葬礼时发现，身体实践与物象符号直接参与了“家先—后人”社会秩序的再生产[3]。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中国丧葬文化的一般逻辑——每一次穿戴丧服，都是一次对自身家族身份的确认与重申。

郭于华指出，“一人之死往往是整个家族或村落的大事”[2]。丧葬仪式的“大事”性质，恰恰源于其家族整合功能：长者的离世使家族网络出现一个“节点空缺”，丧葬活动通过召集所有相关成员、按五服制度重新排定座次，完成了家族关系的重新确认。李伯森在《中国殡葬史》中也强调，丧葬仪式在沟通家庭、宗族、村落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3]。

3.3. 道德隐喻：仪式现场的社会教化

中国民间流传“丧礼是办给活人看的”这一说法，朴素地道出了丧葬文化的道德功能。丧葬仪式中的一系列礼仪规范，表面为送别死者，实质是对生者的道德教育。

孝道是这一教育体系的核心内容。孝道包含“事生”与“事死”两个层面：父母健在时须养亲、敬亲；父母去世后须安葬、祭奠，并承继其遗志[14][15]。肖群忠在《孝与中国文化》中指出，中国文化传统中“送死”甚至比“养生”更重要，因为养生尚有弥补之机，送死则是最后一次表达孝心的机会[15]。这一观念使丧葬现场成为孝道的终极考场——子女在葬礼上的哀戚程度、丧服的穿戴规范、祭祀的隆重与否，均成为家族及社区对其道德品行的公开评判依据。

“盖棺定论”是另一重要道德隐喻。该成语意指一个人的是非功过只有到死后才能得出最终评价，其认知机制在于将死亡转化为道德评价的终点站。李景林分析儒家丧祭理论时指出，“慎终追远”的目的不仅在于追念先人，更在于通过追念来规范现世、激励后人[14]。代际之间的道德契约由此以隐喻的形式嵌入丧葬仪式：生者如何对待逝者，后人亦将如何对待生者。每一次丧葬活动，都是对这一代际契约的重新签署。

此外，儒家“哀而不伤”的情感规范也在丧葬礼仪中得到了隐喻性表达。《礼记》对丧礼中的哭泣时间、居丧饮食、起居行为均有详细规定，其用意在于引导哀痛情感在适度范围内表达。这不仅是礼节层面的设计，更是一种生命伦理的隐喻——死者的离世固然悲痛，但生者的生活仍需继续。通过仪式化的情感规制，丧葬文化实现了对个体情感与社会秩序的同步安顿。

3.4. 社会功能隐喻：差序格局的仪式化重演

将上述三个维度的隐喻系统整合起来考察，可以发现丧葬文化承载着一项更大的社会功能：通过仪式的周期性展演，不断重演并强化整个社会的秩序结构。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为中国社会结构提供了经典解释框架[16]。丧葬仪式恰好是这一格局最直观的仪式化呈现：从丧服的等级、灵堂的站位、祭拜的顺序到抬棺的人员安排，所有环节均以逝者为中心，按照亲疏远近的差等逻辑进行组织。冯智明的研究表明，丧葬仪式中行动者完全依据与逝者关系的亲疏薄厚来组织，形成一套动态的差等结构[3]。换言之，每一次丧葬都是一次以逝者为圆心的“社会关系地图”的现场绘制。这一绘制过程具有重要的社会修复功能。在日常状态下，社区中的人际关系往往是弥散的、不清晰的；丧事的发生迫使所有人到场并按既定规则排定位次，宗法伦理与长幼尊卑由此获得一次公开确认。王夫子归纳了丧葬礼俗的多重社会功能：显示家族实力、协调社会关系、巩固人伦关系、灌输道德意识[4]。郭于华也指出，丧葬仪式具有“传导灌输道德意识”的功能[2]。上述功能并非仪式的外加效果，而是通过隐喻性象征自然生成。

丧葬仪式还完成了一项更深层的象征性转化——从混乱到秩序。死亡本身即是一种“断裂”：生命的终结、社会关系的扰动、情感的崩塌。丧葬仪式通过严格的时间表、空间布局和行为守则，将这场混

乱重新纳入秩序框架。冯智明分析红瑶葬礼时提出的“从阴阳区隔到阴阳一理”的过渡[3]，同样适用于理解中国丧葬文化的普遍逻辑：葬礼不仅处理了死者的尸身，更处理了生者的焦虑——它向所有人昭示，社会秩序未被死亡撼动，日常生活的连续性依然存续。

4. 结语

哈维兰曾指出，文化是一个系统，理解其任何一个方面都需要考察其他方面[17]。中国丧葬文化恰好印证了这一判断。它不是零散习俗的简单集合，而是一套环环相扣的隐喻系统。生死隐喻将死亡重构为灵魂的迁徙与安顿，消解了终结的恐惧；家族隐喻将血缘秩序转化为可视化的身体符号，确认了每个人在家族网络中的位置；道德隐喻将丧葬现场改造为社会教化的课堂，传递了孝道、报应与节哀的伦理规范；社会功能隐喻则通过“差序格局”的仪式化重演，完成了社会关系的整合与秩序的再生产。四重隐喻相互嵌套、彼此支撑，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应对死亡的那套独特文化逻辑——它不依赖于系统的哲学论证，也不依附于制度化的宗教组织，而是通过一场场仪式、一件件器物、一个个隐喻，在数千年的实践中沉淀下来，并持续发挥着文化传递与社会整合的功能。因此，研究丧葬文化中的隐喻，其意义不仅在于整理民俗资料，更在于揭示中国传统文化处理终极问题的基本方式——以隐喻为认知工具，以仪式为实践载体，将对生死的理解、对家族的认同、对道德的坚守熔铸为一个自洽的意义系统。

参考文献

[1] 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28-35.

[2] 郭于华. 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 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19-24, 87-96, 152-158.

[3] 冯智明. 身体实践、物象隐喻与仪式过渡: 桂北红瑶“送梅山”葬礼研究[J]. 宗教学研究, 2021(1): 142-148.

[4] 王夫子. 殡葬文化学[M].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7: 45-52, 103-110.

[5]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6] 钟敬文. 民俗学概论[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178-185.

[7] 陈绪波. 先秦儒家死亡观念探析——以《士丧礼》为中心[J].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2022, 39(4): 112-120.

[8] 万建中. 中国民间禁忌风俗[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256-260.

[9] 何九盈. 汉字文化学[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 210-215.

[10] 孟庆楠. 人伦的更迭与延续: 围绕冠、婚、丧、祭之礼的考察[J]. 道德与文明, 2022(4): 56-63.

[11] 丁凌华. 中国丧服制度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33-41.

[12] 徐吉军, 贺云翱. 中国丧葬礼俗[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145-153.

[13] 李伯森. 中国殡葬史(第一卷)[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224-231.

[14] 李景林. 儒家的丧祭理论与终极关怀[J]. 中国社会科学, 2004(2): 56-66.

[15] 肖群忠. 孝与中国文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120-128.

[16]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 23-30.

[17] 哈维兰. 文化人类学[M]. 瞿铁鹏, 张钰, 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34.